

·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

## 我国民生改善的阶段性特征和主要启示

李文<sup>1 2</sup>

(1.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摘要:** 经济是手段, 民生是目的, 民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主题和主线。民生具有持续性和阶梯性两大特点, 我国的民生改善经历了民生滞后型阶段、数量满足型阶段、品质追求型阶段, 新时代以来进入均衡发展型阶段, 并将在未来基本实现现代化后, 迈入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相匹配的文明提升型阶段。回顾并总结我国民生改善的主要历程和阶段性特征, 可以得出三点启示: 一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三是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关键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生改善; 社会史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26)02-0006-12

doi: 10.19366/j.cnki.1009-055X.2026.02.002

### 一、引言: 为什么讨论民生?

从社会史的视角观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 民生是一条最重要的线索。

首先从社会史的特殊性和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学科属性谈起。社会史与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不太一样, 由于学者们对社会的理解不一, 社会史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流派。因此, 尽管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史, 但他们彼此对社会史的理解有差别, 有大社会与小社会之分。通史说认为社会史是一个整体史; 专史说认为社会史是专门史; 范式说认为社会史是一种角度、是一种范式; 等等。当代社会史亦是如此。

社会史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复兴的一个学科。自此之后, 这一学科取得了长足发展。当代社会史的兴起相对要晚得多, 只是在近10多年间。当代社会史承继了古代社会史和近代社会史, 与它们具有同样的学科基础。在当代社会史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研究有别于其他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 它是明确地以社会建设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史, 同时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学科定位<sup>[1]</sup>。所以, 我们把它叫作“国史中的社会史”, 与其他的当代社会史相区别。换言之, 这里所说的社会史研究, 范畴是小社会。

那么, 小社会和我们通常所说的大社会是什么关系? 2006年10月11日, 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胡锦涛指出: “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 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 这要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历史过程。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既要从‘大社会’着眼, 把和谐社会建设落实到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在内的党和国家全部工作之中; 又要从‘小社会’着手, 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 着力

收稿日期: 2025-12-22

作者简介: 李文(1963—), 男,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现实经济、社会问题。

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sup>[2]523</sup>胡锦涛把大社会与小社会的关系阐述得十分清楚,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对应的正是其所说的小社会,他在讲话中提到的关于小社会的内容,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其中,“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一句话指出了小社会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民生。

那么,什么是民生?孙中山曾用过这个词,他提出了民生主义。那时的民生,主要指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此后,民生这个词被陆陆续续用过,但用得不多。直到2003年之后,这一概念重新引起关注,成为热词,但似乎很少有人深究其内涵。笔者认为,民生就是民众的生活需求,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民生需求的满足、民生质量的提升是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社会发展的落脚点,民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主题和主线。这一结论,是从对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当中得出来的。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有时称基本矛盾,有时称主要矛盾。其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讲得很明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社会阶段的体现。那么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1956年党的八大第一次明确提出: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sup>[3]293</sup>。这里阐述得很清楚,下一步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的矛盾,是把我国尽快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改善人民的生活。然而,此后一段时间,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没有得到贯彻,阶级斗争仍然被看作主要矛盾,导致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一些曲折。直到改革开放之后,1981年作出第二个历史决议,才重新恢复了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这也是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之一。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sup>[4]54</sup>在党的十三大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基本任务、发展纲领时,第二个历史决议的精神被进一步重申“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sup>[5]12</sup>这段话后来被经常提及。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sup>[6]11</sup>虽然针对新时代主要矛盾重心变化有了新的提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新提法和原来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既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不断解决这个矛盾,就构成了各个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线。经济是基础、是手段,落实到社会层面,就是要着眼于民生问题的解决,这也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高度一致。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为了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检验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最终要看这个国家国民的民生需求是否得到了相应的满足和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团结一心,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实现了社会全面进步,让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浴火重生。人民生活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顾并展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民生改善历程,对于全面把握经济和社会发展轨迹和发展规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二、民生需求增长的特点

对于民生需求增长的特点,笔者主要将其归纳为两点:持续性与阶梯性。持续性指其一直在延续、不中断;阶梯性指其呈现出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向上提升的态势。

我们先引入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帮助理解这个问题。美国学者 Maslow 是社会心理学家、比较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心理学第三势力的领头人。他于 1954 年出版了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sup>[7]</sup> 一书,国内多译为《动机与人格》,或译为《动机与个性》。在这本书中, Maslow 把人的需求归纳为七种:生理需求,安全需求,隶属于爱的需求,自主需求,知的需求,美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细想一下,人一生的需求大概就是这七种,从出生起渐次产生。比如,人出生之后就要找吃的,这是生理需求。然后,要有人来抱着,这是一种安全需求,而且这个安全需求是有区别的,有的幼儿被某些人抱着不哭不闹,被其他人抱着就不行,因为他们会闻味道,感觉到不一样。他们还希望得到亲人的抚摸,这便是隶属于爱的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有了自主需求,他们独立生存的能力不断提升,渴望获得他人的肯定与赞扬。四五岁的时候有了知的需求,就会反复地问“这个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等问题,这时他们提出的问题特别多,是爆炸性的,而且记忆力特别强。然后是美的需求,开始梳妆打扮,知道要穿好的衣服,等等。再大一点,有了自我实现需求,大人说的话就未必爱听了,个人的自主意识进一步强化,等等。幼儿成长的历程就是这样,人的一生也是这样。各层需求之间不但有高低之分,而且有前后顺序之别,呈现出渐次提升的现象。

有古人把上述社会心理现象称为“不知足”。中国传统伦理以“知足常乐”为美德,将“不知足”视为“贪”,有“人心不足蛇吞象”“得陇望蜀”的成语。明代音乐家朱载堉写的散曲《山坡羊·十不足》将“贪得无厌”、欲望不断膨胀的心理和行为刻画得淋漓尽致。但是,我们也可以将这些心理和行为从正面加以理解,将其视为从个人到社会的普遍现象,视为民生需求永无止境不断递进的生动体现。其实,中国古人也不是一味“禁欲”,而是把“欲”和“贪”区分开,把无节制、不通过正道满足欲望的行为界定为“贪”,强调“以义节欲”“以礼导欲”,类似我们今天强调的“常思贪欲之害”“兼顾效率与公平”。大多数情况下,古人对正当的欲望是持肯定态度的,强调欲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的满足以“人性本能”为起点,以“社会进步”为动力,以“道德完善”为目标,是一个不断递进的过程。

## 三、民生改善的几个阶段及其特征

沿着这个思路,回顾和展望一下我国民生改善的几个阶段。笔者认为,我国民生改善的历程可分为五个阶段:民生滞后型阶段、数量满足型阶段、品质追求型阶段、均衡发展型阶段、文明提升型阶段。

### (一) 民生滞后型阶段

民生是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端,可追溯至晚清洋务运动时期。但中国式现代化一定肇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即从“一五”计划开始。之所以称之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因为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工业化道路的选择,牵一发而动全身。按最初设想,我国原本计划先发展一段时间新民主主义,再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由于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一过渡进程不得不相应提前。提前过渡意味着要更早地推进社会主义,并实施计划经济体制——这也是苏联的实践探索带给我们的启示。这一切努力都指向一个明确的目标: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然而,当时我国一穷二白,经济基础非常差,尤其是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在一个农业国的基础上搞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资金从哪里解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资金只能靠内部解决。因为,我国既不像西方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有殖民地,当时又面临着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不太可能从外部获得资金来源;即便

能够从苏联获得一些援助,也不可能是长期的。所以,从根本上说,我国的发展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这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就明确的。可是,靠内部解决,就必须倾全国之力,让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势必以牺牲一定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代价。

1953年,《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指出,“由于工业化要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而重工业需要的资金多,赢利较少较迟,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所以在工业化时期不能不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但这些困难是必须克服,也是可以克服的。必须教育全党和全体人民认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极端重要的意义,认识它是全国人民的最高的利益,全国人民的一切局部的暂时的利益都应当服从这个最高的利益”<sup>[8]612</sup>。同年,毛泽东与梁漱溟有一个关于“大仁政”与“小仁政”的争论。毛泽东说,我们是要施仁政的,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我们要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sup>[9]163-164</sup>。毛泽东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之前最辉煌的成就之一,便是经过艰苦奋斗,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成为世界工厂,以及成为现在的全世界制造业中心都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为此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民生改善严重滞后。

可以通过积累率来观察一下当时的情况。“一五”计划时期平均积累率为24.2%，“二五”计划时期是30.8%，“三五”计划时期是26.3%，“四五”计划时期是33%，1976年、1977年、1978年分别为31.3%、32.3%、36.5%，非常惊人。而1965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积累率只有19%~24%<sup>①</sup>。如此高的积累水平,势必大大压缩居民消费,加之这个时期内部非生产性积累不足,只占二三成的比重,造成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社会建设欠账很多,居民生活日常消费品长期处于短缺状态。

还有一些具体数据可作为参考。从消费水平上看,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sup>②</sup>,低于1952年的395斤;全国职工(含国有、集体)平均工资575元,低于1966年的583元;许多消费品都需要凭票证购买<sup>[10]17-21</sup>。住房十分紧张,1977年全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仅3.6平方米,要知道1950年尚有4.5平方米。从1949年到1978年,重工业增长90.6倍,轻工业和农业只增长19.8倍和2.4倍,国民经济呈现畸形发展、严重失衡的状态。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曾表示,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sup>[11]5</sup>。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因为严重失衡,不可持续。这并不是否定成就和发展,而是强调国民经济确实失衡到了一定程度。直到改革开放前夕,还有不少农民吃不饱饭,再加上人口一度增长过快,生产效率低下,相当一部分国民收入不得不用来新增人口的生活需要,因而人民生活长期处于低水平的艰难状态。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消费在居民家庭日常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恩格尔系数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1978年我国农村接近70%,超过65%,城市接近60%。单从恩格尔系数来看,当时农村完完全全处于贫困状态,城市接近贫困状态。

当然,在关注民生滞后问题的同时,也要注意当时社会发展呈现出的非均衡特征,即与收入水平形成强烈反差的人类发展水平情况。从1990年开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出版一个人类发展报告。它基本是用收入、健康、教育三个指标,经测算形成一个人类发展指数(HDI),并按该指数对各个经济体进行排名。排名结果显示,从国际上看,通常一国社会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大致是对应的。但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却是一个例外,其社会发展的世界排名,远远超过其经济水平的世界排名,而且是世界上名次差别最大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前夕,中国按人均收入排在世界

① 本文所引数据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出自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下面不一一列注。

② 1斤=0.5公斤。

最贫穷的国家之列,而其人类发展水平却接近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960—1980年,世界上从低人类发展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的国家不过十几个,中国就是其中之一。更突出的是,在这十几个国家中,中国取得的进步最显著,位次上升的幅度最大,取得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社会进步。这是很奇怪的现象。究其原因,首先是教育的进步。通过面向大众发展教育和扫除文盲,中国这一时期人口识字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有了巨大的提升。1949年中国文盲率为80%,1982年则降至22.8%,下降速度非常快。1978年,中国已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5%;而1949年这一数据只有20%左右,也就是说,只有20%左右的学龄儿童能够上学。这是我国取得的一大成就。其次是健康水平的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1981年则达到了67.9岁。我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有如此快的人均期望寿命增长,这一现象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世界银行相关机构专门来中国作调查,他们把经验归结于当时的农村合作医疗等。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我国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时取得了非常突出的社会进步,特别是在教育和健康两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这是一种非均衡的发展,与工业发展成就相比,与教育和健康的进步相比,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长期没有提高。

## (二) 数量满足型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数量满足型阶段,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年,城镇就业方针有了突破,实行“三结合”政策,即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与自谋职业相结合。这个方针的突破,好比在计划经济体制上撕开了一个口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突破才得以兴起。随后到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之后,很快收到了成效。首先是1984年取消了布票,还有一些票证也被取消了。1984年布票得以取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1982年有四套化纤项目实现了全部投产。这些项目源自20世纪70年代的“四三方案”——这是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外国成套工业设备和技术的计划。这个计划之所以能够促成,其直接契机发生于1971年。当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从长沙返回后,提及在当地连购买一块“的确良”布料都颇为困难。毛泽东对此感到不解,便指示周恩来去了解情况,并提出:既然当前与欧美国家关系有所缓和,是否可以探索引进相关的技术。周恩来马上让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sup>①</sup>落实。1973年,国家计委经过研究,提出四套进口方案,计划共花费43亿美元,引进化学工业、化纤工业成套的设备。1982年化纤设备建成投产后,我国人均布匹的拥有量从20尺<sup>②</sup>左右提高到32尺,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穿衣问题。此前人们主要以土布作衣料,此后迪卡、的确良等布料开始普及,布匹问题从根本上得到缓解<sup>③</sup>。

同时,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化纤项目的投产还解决了化肥问题。1980年,我国每亩耕地化肥的投入比1970年增加了将近3倍,每亩耕地的粮食总产量增长了47%,化肥使用的成效显著,每年能增产粮食500多亿斤。这意味着,在化肥厂还没有完全投产的情况下,当时的中国人每人每年能增加口粮60斤<sup>④</sup>。1980年之后粮食产量逐年增长,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突破8000亿斤,比1980年增长27%;到1993年,全国粮食产量突破9000亿斤。粮食产量增长的主要原因应该归结于经济体制改革,农民因此生产积极性高涨,另外也不能忽视化肥、水利、良种等方面的因素。粮食增产后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卖粮难”。之前政府向农民征购粮食,每年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使出浑身解数,是很费劲的。由于粮食连年增产,1985年开始取消粮食统派购制度。1992年陆续放开粮食及其他农产品价格,实行购销同价,继1984年取消布票之后,1993年取消粮

① 1998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23年,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② 1尺≈0.333米。

③④ 参见民族复兴网. 四三方案(2023-08-24)[2026-01-24]mzfxw.com/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6&id=177953.

票。在计划经济时期，粮票是第二货币，没有粮票的话哪里也去不了。假如要出省的话，本地的粮票还不行，必须要全国通用粮票。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粮票的实际功能和作用已明显弱化，但直到1993年粮票才被正式取消。可以说，国家在粮食问题上一直是比较小心谨慎的。

同一时期，在居民家庭日常消费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大约是从1985年开始，城镇出现了粮食消费逐渐下降的现象。农村大致晚了5年，从1990年代上半期开始，出现了同样的现象。1985年城镇家庭人均粮食消费134.76公斤，1990年是130.72公斤，1995年是97公斤，逐年减少；农村也是同样的势头。该时期城乡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食品消费情况如表1所示。主食消费出现下降的趋势表明我们告别了吃不饱的困境，意味着其他的，诸如蔬菜、牛羊肉、鸡蛋、水产品等食品的消费提高了。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性的重要标志。

表1 部分年份城乡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食品消费

单位：公斤

食品种类	城 镇			食品种类	农 村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1990年	1995年	1998年
粮食（原粮）	134.76	130.72	97.00	粮食（原粮）	262.08	258.92	249.28
鲜 菜	144.36	138.70	116.47	蔬 菜	134.00	210.74	208.97
食 油	5.76	6.40	7.11	食 油	5.17	5.80	6.13
猪牛羊肉	18.72	21.74	19.68	猪牛羊肉	11.34	11.29	13.20
家 禽	3.24	3.42	3.97	家 禽	1.26	1.83	2.33
鲜 蛋	6.84	7.25	9.74	蛋及制品	2.41	3.22	4.11
水产品	7.08	7.69	9.20	鱼 虾	2.13	3.06	3.31
食 糖	2.52	2.14	1.68	食 糖	1.50	1.28	1.40
酒	7.80	9.25	9.93	酒	6.14	6.53	6.98

同样地，在这一时期，市场形势发生深刻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的“老三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被“新三件”（彩电、冰箱、洗衣机）所替代。1998年，中国正式宣布，国内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一起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中国彻底告别了短缺的历史。

### （三）品质追求型阶段

在数量满足型阶段，人民吃饱穿暖的需求已基本得到保障。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的需求自然转向要求吃好穿好，时代背景也呈现出一系列重要变化。在这一时期，党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制定了新“三步走”战略，推动社会由低水平的小康社会向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迈进。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突出民生导向：民生立法、民生保障政策密集出台；开始强调社会建设，战略布局从“三位一体”走向“四位一体”；明确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改善民生。

品质追求型阶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2003年发生“非典”疫情，广东和北京当时一度成为疫区。在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之下，我国应急体系、公共卫生体系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暴露出来。对此，党中央作了认真总结，提出要建立应急响应机制，健全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抓社会建设，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搞公共财政，加强民生保障，等等。国家加快了关于教育、医疗的改革步伐，并开始强调社会管理创新。

以食品安全治理、消费者权益保护为例。前已述及，在数量满足型阶段，我们解决了人民吃饱的问题。城市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则从1990年代开始，先后出现了主食消费下降的趋势，人们开始由吃饱向吃好转变。应当说，这一势头在前期发展得比较顺利，但进入21世纪之后食品

安全事件集中暴发,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比如,2003年安徽阜阳的劣质奶粉事件曝出,2004年又出现了苏丹红事件。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相继出现,猪肉、烤翅、火腿等,都出现了问题,2011年前后达到了高峰。这是人们吃饱之后面临的新情况。此外,农药滥用以及污水直排灌溉农田等问题也非常突出。这些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国家层面开始着手立法修法。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颁布与实施,该法的前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由食品卫生转变为食品安全,体现出很大的进步。同时,设立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和监测机构,食品安全问题受到高度重视。实际上,在人们还没吃饱的时候,很多问题就已经存在。只是那个时候首先要解决饥饿的问题,无暇顾及吃好的问题。等到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人们逐渐意识到其他问题,并提出更多需求,消费者的权益意识觉醒了。1983年,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正式确立每年的3月15日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从1991年开始,我国中央电视台每年都播出“3·15晚会”,起到了非常积极的宣传和监督作用。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1999年开始,国家把消费者投诉举报电话设立为12315,后来还开启了全国互联网维权平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发生在由数量满足型阶段到品质追求型阶段转变的前后。

#### (四) 均衡发展型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转化为均衡发展型阶段。在这个阶段,党中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宣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作出从2020年到2035年、再到2050年的“两步走”战略安排。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sup>[6]11</sup>

面对新问题新挑战,党中央作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同时,实施一系列的区域综合发展战略,如“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以及之前提出的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这些战略优势互补、配套实施、协同并进。此外,还突出倡导公平正义,强调共享的发展理念,推进共同富裕。这些举措都旨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进全面协调发展。其中有些宣传表述非常直白,比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薄弱环节在农村,所以重点要抓精准脱贫,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脱贫攻坚以来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变化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我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作出了关键性贡献。其他成就还有很多。比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解决了“三个1亿人”的问题<sup>①</sup>,城镇化水平逐渐提高,2023年城镇化率达到66.16%。实际上我国已经过了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进入城镇化放缓

<sup>①</sup> 解决“三个1亿人”的问题,即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口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的阶段，正向城镇化后期转变。再者就是乡村振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我们既要关注农业的现代化，也要关注农村的现代化，目前看来，我们的工作还任重道远。在农村调研时，还能看到不少荒凉的景象，这是城市化过程中必然伴随的现象。即便农村的房子盖得再好，也难以看到人气。基本上是老年人在农村，青壮年都出去了。未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大的短板仍在农村，还是在农民。相信党和政府还会相应地出台一系列政策，重点攻克这一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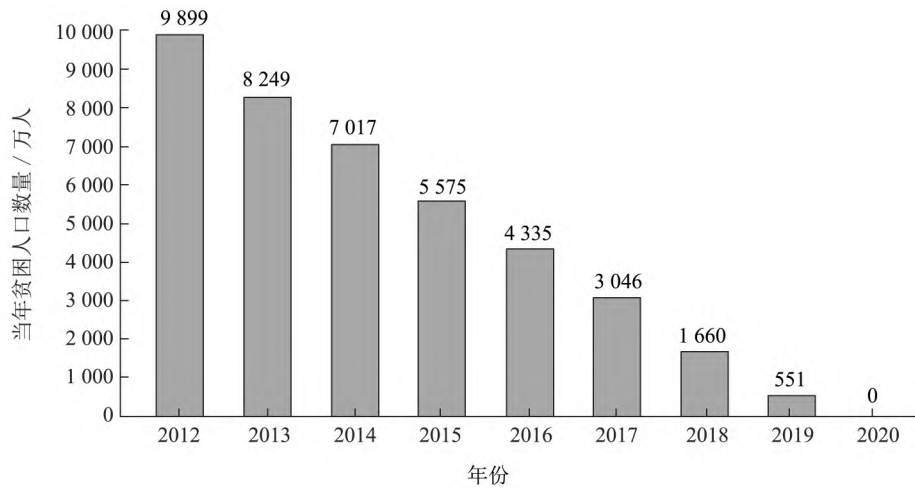


图1 2012—202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变化

从本质上说，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不平衡问题。我国官方公布的2003—2019年基尼系数如图2所示。长期以来，我国基尼系数一直在0.4以上徘徊，国际上一般认为0.4是一个容易引发社会问题的节点。我国能够一直保持社会安定，应当归功于经济发展进程中社会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尤其是扶贫方面的贡献非常突出，所以近10多年来基尼系数总体呈逐渐下降的趋势。但是必须正视，我国现在的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而且，从图中可以看出，2019年出现了一个翘尾现象。这是为什么？笔者认为，可能由于扶贫对象大量减少，相关社会政策作用面缩小之后，相对贫困问题开始凸显，基尼系数的“尾巴”就又翘起来了。所以，当前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列举部分国家部分年份的基尼系数，如表2所示。我国要实现全面现代化，必须要实现更加均衡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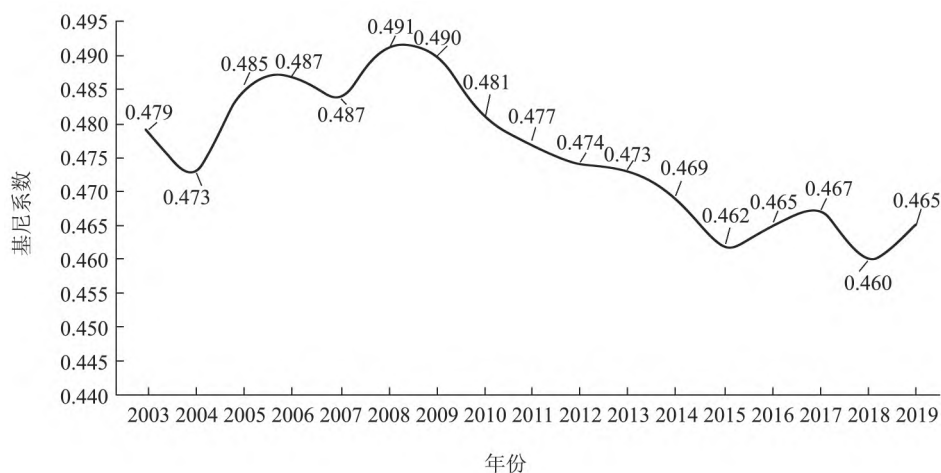


图2 2003—2019年中国基尼系数变化

表2 部分国家基尼系数

国家	年份	基尼系数	国家	年份	基尼系数
美国	2010	0.378	南非	2009	0.631
英国	2010	0.342	巴西	2009	0.547
日本	2010	0.329	墨西哥	2008	0.483
德国	2010	0.295	印度	2005	0.334
法国	2010	0.337	马来西亚	2009	0.462
意大利	2010	0.337	菲律宾	2009	0.430
韩国	2010	0.315	埃及	2008	0.308
俄罗斯	2009	0.401			

注: 资料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

均衡发展是有目标指向的。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所作出的目标安排,就是“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sup>[6]28</sup>。正因为早已设定这样的目标,党和国家这几年特别强调要把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共同富裕是目标与路径的有机统一,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了这个目标。

### (五) 文明提升型阶段

对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已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后再奋斗15年,按照党的十九大以来的部署,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达到一流发达国家水平。那么,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后,最大的短板可能在哪里?笔者认为,那时我国最大的短板可能在软实力方面,比如社会文明、道德、教育、健康等,把这些短板补齐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2001年出台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指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应当引起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sup>[12]2</sup>国家在21世纪初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社会文明和公民道德建设问题。党和政府历来就非常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一直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2001年出台的《纲要》针对性很强、很具体。2019年又出台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其指出“道德领域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不同程度存在道德失范现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仍然比较突出;一些社会成员道德观念模糊甚至缺失,是非、善恶、美丑不分,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造假欺诈、不讲信用的现象久治不绝,突破公序良俗底线、妨害人民幸福生活、伤害国家尊严和民族感情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sup>[13]2-3</sup>将之与2001年出台的《纲要》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两者的表述大同小异,这说明我国在公民道德建设这一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不太理想。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公民道德建设还没有触及全民,成为全民最基本的民生需求,所以到现在仍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管子·牧民》中说,“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将来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物质方面的需求得到满足,那么社会发展关注的重点自然而然地就会转向社会文明程度的巨大提升。比如,社会对残疾人、老年人的关照是不是能够做到无微不至?建设的硬件设施是不是能够以人为本?现在,各类设施都是具备的,但是很多还未能做到以人为

本。在建设的时候，有为老年人、残疾人服务的意识，可往往建成后对于是不是真正方便他们使用，考虑得不够周全。所以，正如《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所指出的那样“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紧迫、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要适应新时代新要求，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把握规律、积极创新，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推动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一个新高度。”<sup>[13]3</sup>这的确是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事情，或许会贯穿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中。

#### 四、主要启示

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民生改善发展阶段的简单回顾，可以得出以下三点启示：

一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不难发现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邓小平指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sup>[14]250</sup>应当说，正因为有了这样基于过往实践的反思，才有了拨乱反正，才有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所以从那个时期起，党中央一再强调，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sup>[15]370-371</sup>江泽民指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sup>[16]222</sup>胡锦涛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只有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才能筑牢国家发展繁荣的强大物质基础，才能筑牢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强大物质基础，才能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这是我国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的根本原因。今后，我们必须继续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能有丝毫动摇。”<sup>[17]535-536</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sup>[6]12</sup>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地强调并坚持了这一点。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40多年前，邓小平不仅引导全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还引导全党把经济建设的目标转移到人民生活的改善上来。1978年，他在回顾历史后指出“干社会主义，要有具体体现，生产要真正发展起来，相应的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逐步提高，这才能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sup>[14]277</sup>也就是说，我们须臾不可忘记发展的目的最终是要落实到人民生活的改善上来。他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sup>[15]116</sup>回顾历史，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一点。应当说，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实惠，就是让发展重新回到逐步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上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sup>[18]46</sup>这段话赢得了全场热烈掌声。他接着说“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sup>[18]46</sup>新时代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针对这一方面作了许多阐述。例如,“民生是最大的政治”“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等等。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出民生的特点。当前,我们强调要实现高质量增长。笔者以为,只有真正与民生需求相匹配的增长才是高质量增长。回顾历史,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三是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我国在抗击“非典”疫情后总结经验时得出的一个明确结论。2003年,胡锦涛指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我们讲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的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我们要更好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坚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促进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不仅要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投入,而且要增加促进社会发展的投入,增加保护资源和环境的投入。”<sup>[2]67</sup>此后,我们逐渐意识到国家的社会建设比经济建设落后很多年,于是开始呼吁抓社会建设,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明确提出五大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协调”出现了20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协调发展,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等。可见,新时代的协调发展已经远远超出经济和社会的范围,扩大到了“大社会”的总体。

综上所述,以民生为视角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既可以清晰地看到所经历的曲折和巨大进步,也能够深刻地体会民生需求的持续性、阶梯式跃迁,更能为我们今天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诸多有益启示。

#### 参考文献:

- [1] 李文.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研究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 [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4 (4): 49-61.
- [2] 胡锦涛. 胡锦涛文选: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九册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5]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 [6]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7] MASLOW A H.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M]. New York: Harper, 1954.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四册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二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 [10] 李岚清. 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 [11] 华国锋. 团结起来, 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8.
- [12]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13]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 上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 [1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6]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17] 胡锦涛. 胡锦涛文选: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 [18]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Phased Characteristics and Key Insights into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 China

LI Wen<sup>1 2</sup>

-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Shanxi, China;  
2.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Economic development serves as a means, while the well-being of people is the ultimate objective.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constitutes the theme and main thread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aracterized by sustainability and phased progression, the evolu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three distinct phases: the initial phase of lagging development, the phase of focusing on meeting quantitative needs, and the phase of pursuing quality. Since the advent of the New Era, China has entered a stage of balanced development. Looking forward, upon achieving basic modernization, China is poised to advance into a phase of civilizational enhancement, aligned with the overarching goal of building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Reflecting on and summarizing the key milestones and phas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 China yields three critical insights: it is imperative to mainta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central task; it is essential to uphold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and it is crucial to persist in promo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Key word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social history

(责任编辑: 徐欣)